



华北第一个人民政权的创建者之一——赫光



赫光。

走上革命道路

赫光8岁入私塾读书;11岁入固原县高等小学;16岁,考入平凉陇东公立中学堂。他勤奋好学,在老师和同学中赢得了赞誉。

1922年,陇东镇守使张兆铎为扩充私人势力,在青年学生中招考军官。赫光应考,被派到北洋军阀吴佩孚办的洛阳讲武堂学习军事。当时,马列主义已在全国传播,讲武堂已有共产党的活动。赫光在进步同学的介绍下,接触到了马列主义书籍。

1924年,赫光从讲武堂毕业,由于学习成绩出众,被吴佩孚任命为直属机枪连连长,后又提升为迫击炮营营长。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部在秦皇岛被奉军包围,几乎全军覆没。赫光从战场上脱险,年底由天津返回家乡。此时的固原农村,在1920年大地震之后,经济凋敝,匪盗横行,民不聊生。许多赶着毛驴运煤炭以求温饱的农民,常被土匪抢去毛驴,扒光衣服。赫光目睹这种情况,十分愤慨,曾拿上父亲私藏的手枪为农民保释。在家期间,他从现实中进一步认清了社会的黑暗,政权的腐败,民族的危机,人民的苦难。1926年农历五月七日,赫光辞别年老的父亲,留下怀有身孕的妻子,毅然踏上征途,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

赫光离家之后不久,就投入共产党的怀抱,在中共豫陕特委的领导下,从事革命活动。由于上过军事学校,参加过战争,有军事知识,党组织确定他搞兵运工作。1926年冬,赫光和苗广义、刘明德、浦子华等十多名党员,受党组织派遣到安徽阜阳,进入国民党四十七军高桂滋部。这支部队,共产党的力量比较大,像留守司令部特务连和高建白教导团的九个连,都有共产党的支部或小组,大部分连、排、班长都是党员。赫光被任命为军部政委,这个职务,非常便于和其他党员联系。

赫光(1902—1931),原名万锡斌,字季奎,宁夏固原人,中共党员。1931年,根据中共中央和山西特委的决定,赫光参加并领导了著名的“平定兵变”,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和中华苏维埃阜平县政府。同年8月,在阜平城西法华村受降国民党军队时,遭敌暗算,壮烈牺牲,年仅29岁。

积蓄革命力量 发动“平定兵变”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惨遭杀害。当反革命魔爪伸向高桂滋部的时候,党组织将一些容易暴露的党员撤离,留下隐蔽较好的同志继续坚持斗争,赫光被指定为负责人之一。

这时,赫光看准了放羊娃出身、在军部当通讯员的齐渭川,给他灌输革命思想。在此期间,赫光与中共皖北特委书记魏野畴取得了联系,经常和他研究工作。在皖北特委的积极协助下,发展了一批党员,党在第四十七军的力量得到了恢复。

1928年,高桂滋部奉命由阜阳向山东进发。赫光征得中共皖北特委同意,准备在金乡县羊山集举行兵变。但因组织不够,兵变未能成功,有的党员被敌人杀害。党组织在总结这次失败教训时认为:要想兵变成功,必须由共产党员取得部队的实际指挥权。于是,赫光千方百计离开军部,当了一名营长。

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后,高桂滋部由利津、蒲台渡黄河,经惠民、衡水、正定、十八盘,到达山西平定县驻防。高部缩编为第十一师,各级军官随之降级,赫光降为连长。

7月5日晨,起义的七个连1100余人集结在孟渭城村外的岔路口。谷雄一直布:经党中央批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正式成立。然后举手表决,推举赫光为军长,窦宗融为副军长,谷雄一为政治委员,刘明德为参谋长,刘子祥为政治部主任。之后,赫光站在一个土丘上慷慨激昂地说:“从今天起,我们是工农红军了,是共产党领导的红二十四军,再不是国民党的什么高桂滋部队了!”接着宣布了红军的纪律:“要坚决执行命令,不能有一丝一毫虚假。要爱护百姓,打土豪,分田地。要公买公卖,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以后如有违犯者,按军法从事。”

会后,部队举起绣有“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大字的军旗,向五台山地区挺进。红二十四军向五台山挺进的沿途虽未受到阻击,但当时该地区敌军云集,不利于红军活动。赫光与谷雄一等同志研究,一致认为:红二十四军刚刚建立,不能硬拼,应避免之锐,向晋冀两省交界、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地处太行山中段的阜平发展。先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尔后再向五台山进军。

1931年,高桂滋部又有五六十名共产党员。骨干力量大部分在赫光所在的一团。许多党员担任下级军官,握有实权,大部分士兵也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当时山西驻扎了大量军队,给养困难,士兵怨声载道,人心思变。中共山西特委于5月专门召开会议,经过认真研究,决定举行兵变,将高桂滋部3个团拉出来,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在五台山一带建立革命政权,并确定了干部人选,上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一决定。中共山西特委向赫光传达之后,一场组织兵变的斗争便在第十一师积极开展起来。

赫光和其他同志一起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从兵变动员到行军路线,作了周密的安排,还计划了应变方案:万一受阻,就先到河北阜平,壮大力量后再到五台。

为了取得领导的具体领导,赫光曾借故亲自到太原,向山西特委书记刘天章汇报了兵变准备工作情况,并交换意见。

6月下旬,高桂滋突然逮捕了第一团二营八连共产党员、排长刘玉珊。赫光立即派共产党员、副营长刘明德到太原,向中共山西省委(特委改置)汇

组建红二十四军 积极开展工作

于是红二十四军从柏兰镇拐往东南方向,回孟县,翻十八盘,7月13日进入河北平山的蛟潭庄、柳木园一带,和地方保安团打了一仗;17日,过灵寿县;18日到达阜平县。部队在易家庄和菩萨岭遇到保安团的阻击,红二十四军兵分三路,中路打着红旗正面前进,两侧迂回包围,吓得保安团狼狽逃窜。国民党县长也弃城而逃。

通过放粮及宣传教育,在群众对红军有了认识的基础上,赫光和其他同志一起,和当地党员、群众反复商量,酝酿建立阜平革命政权。7月26日,在县政府大堂前的院里,举行了有1000多人参加的政府成立大会。

革命政权建立后不几天,农民协会、小商人协会、锄奸团相继成立,各项工作迅速开展起来。就在红二十四军创建阜平革命根据地的时候,平汉线上爆发了张学良、石友三战争。

8月,国民党军石友三部第27旅采取阴谋诈降的手段,诱骗红军前来受降。红二十四军的领导同志在讨论沈克诈降这一事件时,虽也有人提出疑问,但大多数认为沈克是一支杂牌军队,

刘天章等认为时机成熟,应立即举行兵变。山西省委马上展开紧张工作,制作军旗,刻制印章,印刷布告、传单。中共山西省委请示党中央同意,派山西军委书记谷雄一协助赫光领导兵变。

7月3日,谷雄一见到赫光便立即传达省委决定,商定具体行动方案。第二天,适逢星期六,晚上军官回家,士兵自由行动。高桂滋及所属三个团长王子宜、高建白和刘杰三,去北平给高桂滋父亲祝寿。于是,赫光、谷雄一决定4日晚12时举行兵变。

一切就绪,只等起义,不料师部手枪连一个班长(党员)醉酒泄密,敌人在内城加强了警戒,调兵控制了重要通道。赫光得知这一意外情况,当机立断,严肃地命令提前半小时行动。住在城隍庙的一团二营士兵一拥而上,占领团部之后,向司令部、县政府所在的内城进攻。因敌人已有准备,城门紧闭,火力密布,起义部队几次冲锋,没有攻下。由于怕拖延过久,被孙楚、李生达部察觉,起义的一团顾不得接应二、三团,只在大街、小巷张贴盖有军长赫光大印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布告和传单,趁夜出东门,撤离平定城。

石友三已败,处境困难,投奔红军是真心。因而,丧失了了对敌人的警惕,便决定叫沈克把部队开到阜平城东、城西进行收编。谷雄一、窦宗融、李英兰等赶往离县城50多里的王快镇去迎接,一进村即被秘密扣押(后送北平杀害)。

沈克见阴谋得逞,于8月10日派赵海清旅,从王快开往阜平县城,假称“奉谷政委命令”,前来接受改编。赫光信以为真,叫他们驻在城西五里的法华村。赵海清还派副官宋植到军部说,给养困难,军心涣散,要求赫光军长尽快接见。赫光、刘子祥与6名战士,带着银洋、肉、白面等慰问品,兴致勃勃地赶到法华村。

发现赵旅诈降后,赫光等在突围中遭到阻击,英勇地倒在了血泊中。同去的其他7名同志,除一名战士冲出重围回城报信外,其余人都英勇牺牲了。十恶不赦的敌人,将赫光、刘子祥的头铡下,装入酒桶,送到北平,还拍成照片,令士兵传看。法华村人民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将赫光等7位烈士的遗体安葬在村东北山脚下。

(据《中国军网》)

三五九旅在盐池打盐

盐池县以境内众多的盐池而得名,食盐既是人民和军队的生活必需品,又是多种工业的原料。早在1937年8月,中共中央国民经济部就发出“大家到盐池驮盐去”的号召,组织打盐、运盐销售,以发展边区经济,改善群众生活。1940年的严重灾荒影响到边区内外食盐的供应,边区政府为了促进产盐运盐业的迅速恢复与发展,确定“以军队生产为主,盐民产盐为辅”的方针。

1941年秋,八路军120师359旅四支队千余人,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来到盐池县的花马池打盐自救,历时一年有余。

359旅四支队刚到时驻扎在盐池县城,为了不打扰当地群众,八路军战士们在长城上掏了100多孔简陋土窑洞。随后,战士们一边捞晒成盐,一边砍沙蒿,筑坝畦,整盐坑,为来年大规模打盐创造条件。战士们克服了种种困难,苦战不休,一堆堆食盐像小雪山一样堆在了盐湖畔,使盐池县的盐产量逐年增加。这些食盐不仅满足了革命圣地延安和军民的食盐需要,而且还通过各种渠道输入国民党统治区,换回粮食、布匹、钢铁、药品、器械等急需物资,对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活跃边区经济贸易,支援抗日战争发挥了重大作用。

1942年,边区政府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又将“以军队生产为主,盐民产盐为辅”的方针改为“盐民产盐为主,部队产盐为辅”。积极动员农民以及机关、部队、学校组织人力下湖打盐,并利用毛驴、骆驼将盐运往陕北、绥远等地,换回布匹、粮食、药材、通讯设备等,在解决边区军民实际困难、满足前线需要的同时,增加了当地群众的收入。

1942年冬,359旅四支队打盐告一段落,开赴盐池县城休整。1943年春,接到党中央命令,359旅四支队开赴延安南泥湾,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如今,留在长城边上的100多孔窑洞,仍然见证着当年359旅指战员们的英雄业绩。

(据宁夏国防教育网)

萌城阻击战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先后在会宁、将台堡胜利会师,对国民党在西北地区的统治造成严重威胁蒋介石很恐慌,他不甘失败,立即调集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红军,企图将红军在西北地区一举歼灭,为此还赶到西安亲自督战,依照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红军主力由同心一带逐次向东转移。为了迟滞敌人追击,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彭德怀总指挥命令部队在有利地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一至两个师,以阻止敌人的进攻。

11月12日,红四军、三十一军奉命迅速向东转移。16日,行进至宁夏盐池萌城、甘肃环县甜水堡地区占领阵地后准备迎击:将追击至此的国民党胡宗南部。17日下午1时,胡宗南部第一师孤军深入,自豫旺堡经范家大坡、东家沟向萌城、甜水堡前进。其先头部队第二旅的一个团前进至石梁山下。红九十三师师长柴鸿儒指挥阻击部队突然发起攻击,枪声四起,就像放鞭炮一样,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倒下一片。敌人不甘心失败,轮番向山上发动进攻。我军居高临下,打退了敌人的一次又一次进攻,同时,红九十一师主力向敌右侧包抄攻击,形成南北夹击之势。这时,几架敌机俯冲下来,轰炸我军阵地,敌后续部队迅速跟进,乘机向我军发起猛攻。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红九十三师师长柴鸿儒身先士卒,冲上阵地,指挥部队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并击落一架敌机。战士们高兴得欢呼起来:“把敌机打落啦!把敌机打落啦!”敌人见势不妙,慌忙抢占其左翼要点羊粪山,刚刚接近山顶,又遭遇到红四军预伏部队的猛烈射击。在红军的三面夹击中,敌人死伤累累,向草坪山狼狽溃逃,此战达到了阻敌前进的目的,共毙伤敌团长以下600余人,缴获步枪百余支及大批弹药和军用物资。在这次战斗中,红军优秀的指挥员——红九十三师师长柴鸿儒、十师政治部主任彭瑞珍等壮烈牺牲。

萌城战斗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在宁夏境内进行的最后一次激烈战斗,给胡宗南部第一师以沉重打击掩护了红军主力的安全转移,也给刚刚诞生的盐池、豫海、环县等苏维埃政权扫清了障碍。

(据《宁夏党史故事》)

宁夏四处“半个城”揭秘

宁夏曾有几处“半个城”。其中一座就是指同心县人民政府驻地豫海镇的旧城遗址。其之所以知名度高,主要是因为1936年红军西征中三大主力会师之后,曾帮助当地人民群众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县级的民族自治政权——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

另外几处被称为“半个城”的地方,让我们一一来揭开“面纱”。

同心县的“半个城”

这座古城位于清水河沿岸,因近河而被洪水冲毁城墙东南一角,故世人俗称其为“半个城”。

据清朝宣统年间修纂的《平远县志》记载,其真实地名为“同心城”,书面俗名又称为“半角城”。至于何年始筑此城,又是何人命其名,何时被洪水冲毁,地方史志均无记载。

《平远县志》还记载,同心城为明朝(宏)【弘治】年间修筑。明朝属宁夏镇灵州守御千户所辖屯堡之一。清朝于该城设置巡检司。《平远县志》记载:此城城墙周长二里半,系土筑,城虽小而位置相当重要,因为它位于宁夏镇通往固原镇的交通要道上,境内有军塘驿站四处——惠安、韦州、下马关、预旺城。

权,新县名曰平远县,寓意为平定边远地带的一次动乱,可见该县名本身就带有震慑的意思。民国年间先后改名为镇戎县、预旺县和同心县。

新县治设置在明代内外边墙交会处的下马关城,这一地区原为明朝宁夏庆靖王府牧城,弘治十五年(1502年)为三边总督秦紘始筑关城,城周长五里七分,内土外砖,高阔各三丈五尺,系宁夏镇与固原镇交界处重要军事要塞,亦是三边总督每年“防秋”亲赴宁夏镇后花马池城坐镇指挥的必经之处。该县上隶宁夏府管辖,下辖十个里甲,分别是:

在城里。今宁夏同心县下马关镇城关。

预旺里。今宁夏同心县预旺镇。元朝为豫王封地,始筑城称豫王城后废。明朝在此重新筑城,并设置平虏守御千户所,因为与宁夏平虏所重名,故改名为平远千户所,上隶固原卫(军事上归宁夏镇指挥),明代所城周长五里三分,高阔各三丈二尺。1936年,红一军团司令员彭德怀率西征红军总部曾驻此城。

毛居士井里。今甘肃省环县毛井里。(元)【圆】城子里。在今甘肃省环县白马废城东20里,与毛居士井相邻,距县城下马关城210里。

白马里。今甘肃省环县白马乡,有白马废城一座,为明嘉靖四年(1525年)三边总督杨一清筑,土城,周长五里三分,高阔各三丈。永固里。今宁夏同心县高台水里。今宁夏固原市原州区七营乡境内,亦称可堡,即明朝镇戎所筑地。夹道里。今址不详。

同心城里。今宁夏同心县预海镇境内。旧有“半个城”一处,传说筑于元朝,弘治间重建土城,周长二里半,为宁夏至固原军塘上的重要据点。

韦州里。今宁夏同心县韦州镇。原有废城一座,系西夏首领李元昊始筑并改为韦州监军司和祥祐军,成为军事重镇。明朝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为重建三年(1401年),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庆王朱栴,在此暂居九年。弘治年间,宁夏巡抚王珣在此筑新城,周长二里。

盐池县的“半个城”

旧有废城遗址,位于高沙窝镇兴武营村东300米。不知何时修筑。曾有唐城之说,民间称之为“半个城”。明朝正统九年(1444年),宁夏巡抚金濂修复旧土城,取名兴武营城,城周回三里八分,高二丈五尺,池深一丈三尺,阔二丈,驻都指挥守备。成化五年(1469年)改升宁夏东路协同分守。正德二年(1507年),三边总督杨一清请设兴武营守御千户所,调拨西安、宁夏等卫官军驻守,直属陕西都司。万历十二年(1584年),宁夏巡抚晋应槐改土城为砖城,开东、南二门,各有门楼一座。

据宁夏文物部门1981年田野调查实测,现兴武营城北靠宁夏东边墙头道边,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约480米,南北宽约440米,墙体为黄土夯筑,外甃砖石。存高7米,基宽10米,顶宽3米至4米。城四隅设角台,西北墙各有5个马面。东、南墙正中设门,门外设瓮城。瓮城长30米,宽20米。护城壕深1米至2米,宽12米。目前墙体和护城壕基本被流沙掩埋。该“半个城”遗址与明筑兴武营遗址,并非一城,兴武营

古城位于高沙窝兴武营村南500米。

隆德县的“半个城”

在各种史书,甚至在宁夏和隆德县的一些地方史志中也鲜有提及。省、县、乡各种地图均只标出“新街村”,而没有出现“半个城”的地名。据国家文物局主编出版的《中国文物地图集·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册》所记,这座“半个城”址位于今隆德县奠安乡新街村南1公里处。城墙依北侧山坡由上至下而筑,利用自然山坡地势阻挡敌人骑兵的冲击,可谓别出心裁。旧城址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90米,南北宽80米,城墙系黄土夯筑,基宽7米,顶宽3米,存高1米至10米,夯层厚15厘米至20厘米。今仅残留西北角一段城垣,且破坏严重。城内地面散落具有宋金时期特色的黑色、青色瓷片及铁马刺、铜鞮等弃物。

彭阳县的“半个城”

经综合所查阅的资料,文字中记述甚至提及彭阳县“半个城”的史志等书籍寥寥无几。但民国年间编纂的《固原县志·建置志》卷之五的《区划》中记述:民国间,甘肃省实行多次县制改革,其中,于1937年划分全县为五区十六乡镇,在二区所辖万安乡下所领的村级建置中有一处“半个城”村。

另外,在《固原县志·建置志》志首所附的一幅《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固原县政区略图》中可以看出,是年固原县被划分为五个区,其中第二区境内在与甘肃省环县交界处标有“万安监”和“半个城”。

(据《宁夏文史资料》)

抗战名曲《松花江上》在宁夏的传播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抗日战争期间,一曲《松花江上》传遍了中华大地,激励着全中国人民同仇敌忾,推动了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怒潮。

《松花江上》这首名曲诞生在“西安事变”前夕的古城西安。在周恩来全力解决“西安事变”时,作为周恩来副官的宁夏籍张子华当时也学会了这首歌。他在1937年初写给在北平上学的宁夏同乡张致承的信中告诉他这首抗战好歌。同年夏天,张致承因病回家休养,在中宁恩和堡向一些同学告知了《松花江上》的歌词,这首歌开始传入宁夏。

1937年7月,张子华以八路军总部参谋、周恩来副主席秘书的身份来到宁夏,同马鸿逵商谈联合抗日和建立统一战线等事宜,推动宁夏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张子华在宁期间利用过去的关系,和时任国民党宁夏省党部科长的袁章、雷启霖等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宣传我党关于国共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及对宁夏的方针政策,嘱咐他们在学校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同时给他们教唱了《松花江上》,通过学唱他们也认为这是宣传抗日的好歌。张子华在回西安途中中宁恩和堡时进行抗日宣传,恩和学校的校长王耀先、教员安秉胜、马成汉等人都听了张子华的宣传,也都学会了《松花江上》。张子华到了固原时,专门到学校开展各界群众代表参加的宣传抗日讲演,并向大家教唱了《松花江上》,这首抗战歌曲在固原传唱开来。

1937年8月下旬,从事抗日宣传活动的“新安旅行团”来到宁夏,他们在宁夏的公开场合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一首《松花江上》使宁夏境内的人们都知道了。这为以后宁夏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成立“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奠定了基础。这首著名的《松花江上》在宁夏从此传唱开来,也使很多年轻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据抗日战争纪念馆)